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

西势东渐 与东方世界的回应

——近代中日史事和人物散论

张富强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98
K250.7
35
2

西势东渐与东方 世界的回应

——近代中日史事和人物散论

张富强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C

454758

责任编辑：杨小虹 姚军毅

封面设计：迪 赛

责任技编：孔洁贞 黎碧霞

西势东渐与东方世界的回应

——近代中日史事和人物散论

张富强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新世纪电子媒介有限公司排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厂址：韶关市五里亭)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1插页 275,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218-02383-5/K·567

定价：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

总 序

于幼军

冬寒夏暑，春华秋实。社会科学园地的耕耘者，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汗水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的出版，就是金灿灿的果实。

我们的时代需要理论。理论对社会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已被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人文主义思想和精神，就不会有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的创立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不会有近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批国家的胜利；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很难想象，没有理论，社会的巨轮能够在历史的航程中自由行驶。今天，我们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当中，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和策略，以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要求我们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可以使我国后来居上的发展道路；要求我们探索和倡导新思想新观念，回答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有着壮丽的事业。社会科学大有作为。

在社会科学理论园地耕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幸的是，我们有一支乐于在这块园地默默耕耘的队伍。正是他们的勤奋与才华，使得我省的这块园地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将展示我省这支队伍中的中青年学者的探索历程和学术成果。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决定组织出版这套文库，更主要的是借此推动广东的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队伍建设，促进广东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长江后浪推前浪，要使社会科学事业如同长江之水奔流不息，唯有源头活水不断。我们要看到，广东社会科学理

论研究队伍在人才辈出的同时，也存在人才流失、一些单位和学科后继乏人的现象。因此，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思想活跃、理论素质好、科研能力强的跨世纪中青年社会科学人才，刻不容缓。我们要努力创造让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尽快成长的条件；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形成活跃的学术氛围；要深化社会科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机制。我相信，文库的出版，必将激励我省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尽显才华，在社会科学理论园地留下自己栽培的一朵奇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入选这套文库，不应成为作者学术成就终结的标志，而应该成为新的起点。中青年是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代。我衷心希望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到改革开放实践的洪流中去，把握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行创造性的理论研究；认真学习新知识，扩大知识面，更新知识结构，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改进研究手段，提高科研能力；敬业乐业，不畏艰辛，以扎实、严谨的学风，刻苦治学，勇攀高峰。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才会有朝气、有活力；我们的社会科学园地，才会姹紫嫣红，春色满园。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

- 《经济学探索与研究》
- 《第三产业与服务消费品研究》
- 《文学的锣鼓》
- 《在改革开放中重塑人格》
- 《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 《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创造财富》
- 《广东改革与发展探索》
- 《接合与更替》
- 《农业·农村·农民》
—— 思考与选择
- 《变革与探索》
- 《西势东渐与东方世界的回应》
—— 近代中日史事和人物散论
- 《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沉思》

目 录

略论中国外交早期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1)
日本大君外交秩序的设定及其对西方冲击的回应 ·····	(39)
论马关议和期间中日全权大臣的交涉术及其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65)
《中日修好条规》与日本的领土扩张主义·····	(88)
“三国还辽”前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及其 外交转折·····	(113)
试论广州钦差大臣制度的形成及其终结·····	(136)
湘军集团与“借兵助剿” ·····	(152)
关于近代中国“买办”的历史作用再认识·····	(168)
唐廷枢与近代民族企业·····	(180)
李鸿章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简论·····	(203)
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新尝试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一书评价 ·····	(230)
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	(247)
简论儒家政治家李鸿章的政治性格·····	(284)
论李鸿章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其“自我”塑造·····	(301)

李鸿章与 1873 年外使入觐	(317)
关于《李鸿章日记》及其英文版节译本的真伪.....	(331)
西势东渐与民初广州城市风貌的变迁.....	(342)
浅论广州商业文化的近代化及其特点.....	(370)
潮汕文化特质散论.....	(381)
编后语.....	(394)

略论中国外交

早期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所谓外交，就是指“代表国家与从事谈判的学问和艺术。”^①“作为一门学问，其目的在于通晓各国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政治关系，各自利害得失，历史传统，以及条约所规定的条件；作为一种艺术，其目的在于从事国际谈判——这涉及协调并指导各种政治谈判的能力以及充分了解此类谈判的能力。”^②所谓外交的早期现代化，就是指世界各独立国家在摆脱中世纪状态走向近代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以国际政治生活规范为指导，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权势均衡”理论，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执行其对外政策，并调整国际关系的历史变革过程。由于中国外交近代化历程是在列强侵逼下缓慢起步的，因而我们涉及这一论题，就

①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Ernest satow, 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第1页。

② 福熙尔：《国际公法论集》(Paul Fauchille, Trait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第1卷，第28页。

不得不考虑到当时中外关系的格局、中国外交观念和外交制度的近代化，以及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平等地位的历程等问题。

—

从远古时代起，东方和西方就形成了互不相同的外交观念和外交礼仪，至 17 世纪初中叶，更出现了东西方两个性质不同的世界秩序并存和对峙的局面。随着西势东渐，两者的冲突势不可免。

考古学的新成就，已提供了欧洲文明发祥地——地中海文明古国君主之间移文往复和外交使臣交聘往来的大量例证。至公元前 5 世纪，希腊城邦就出现了“公开的条约、公开的缔结”的外交规范和近似于常驻外交代表（*Proxemes*）的制度。而稍后的罗马时代，亦给后世留下了为近代国际法学家所称道的、具有精确术语的罗马法。到公元 6 世纪，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帝敕编的著名《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将古罗马法与基督教教义相融合，为近代国际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中世纪的外交，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达到空前的发展。威尼斯成为“大使的学校”，佛罗伦萨则有“外交家的养成所”之誉称，米兰亦不失为“外交的重镇”。至 15 世纪初，意大利各邦通过长期的兼并，只剩下五个势均力敌的强国：那不勒斯、罗马教皇辖地、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权势均衡”为生存原理的狭小的国际体系——意大利国家体系（*Italian States — system*）。

16 世纪的两意大利战争以后，欧洲的政治和外交舞台逐渐转移到日益强盛的法兰西王国，法语取代拉丁语而成为外交语言。1618—1648 年爆发的、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并扩展到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导致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权势均衡”政策为三大支柱的近代欧洲国际秩序——欧洲国家体系(European States—system)的初步形成。战后签订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可视为该体系形成的一个标志。^①从此时起，欧洲各国先后设立了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建立了遣使驻外和常设使馆的制度。外交成为维护欧洲均势与和平，发展睦邻友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至 17 世纪后半期，英国实力（特别是海军力量）不断增长，有力地抵御着法国路易十六蓄谋已久的称霸企图，成为维护欧洲“均势”的西部柱石。18 世纪初，俄国通过北方战争，取代土耳其和瑞典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成为维护欧洲“均势”的东部柱石。18 世纪后半叶，由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崛起，欧洲国家体系获得再次的扩展，其范围东达乌拉尔山脉，西至北美大陆东岸，不仅包括了基督教世界，而且在经历克里米亚战争和巴黎会议（1853—1856 年）以后，还逐渐超越基督教世界而包容一些非基督教的国家。

中国亦有悠久的外交传统。特别在先秦时期，“牧野之战，群后懾服，废部落，行封建，周畿千里，馆其中枢，同姓异姓分土而国，朝覲聘问，礼义明备。迨春秋之世，周室衰弱，诸侯强盛，朝聘修好，会盟结信，俨然现代国际的结合。”^②战

① 奥本海姆：《国际法论集》（劳特帕奇编）（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H. Lauterpacht ed.）第 1 卷，第 763 页。

② 陈顾远：《中国国际法渊源》，台北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第 2 页。

国时期，七雄并立，风行“合纵连衡”之策。不过，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翦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历两千年，除三国时期以外，境内再无正常的外交发生。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在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发源地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发展和繁荣的，况且在东亚大陆又没有一个足以与之抗衡的文明独立国家存在。列朝统治者误以为居于世界文化和地理的中心，是世界唯一文明发达的国家，故以“中国”或“中华”自称。至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或国家，则统称为“四夷”或“四裔”。所谓“夷”，意即不懂文明、不行仁义的野蛮人。对于他们，中国肩负着“以德柔远方”、“恩泽四夷”的天赋职责。

秦汉以来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创建和扩张事业，既是与夷狄国家不断接触和融合，使之“华化”的过程，亦是“蛮族”不断前来侵袭及汉族王朝对其征伐的过程。当汉族王朝足够强大时，就用武力降服之，反之，则采用“羁縻”手段笼络之。隋唐时期，中国军队西征中亚，南伐安南，东进朝鲜，皇帝的“恩泽”远被四裔。明王朝是汉族在推翻蒙古元朝后建立的，其重要性在于使汉民族自古以来世代相承、曾在汉唐时期显示的帝国观念，开始作为一种现实的国际秩序明确地表现出来。明太祖即位之初，即力图表现中华帝国皇帝所拥有“一视同仁”的包容之心，把毗邻朝鲜、安南和占婆的山川视作应纳归中国的自然地势，立碑为记，且“诏谕”四方各国，促令速来“朝贡”。凡接受“诏谕”的国君，授予封号和印章，发给“符信勘合”，让其使用中国历法和文字，享受通商利益，并对贡朝、贡品及应付代价作了详细的规定。明成祖即位后，更采取“德威兼施”的做法，促使安

南、靺鞨、女真、东南亚、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中部地区40多个国家前来朝贡。于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进行环球航行之前约一个世纪，在东亚，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已开始形成一个国际秩序——中华世界秩序。在此后的发展中，渊源于“夷狄”的清王朝，在入主中原后，毫不犹豫地继承“中华帝国”的传统遗产，以儒家的“德治”思想，热衷于在其所知的世界范围内争取“夷狄”前来“归化”。这样，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东亚重新的构筑起一个规模虽不如前，但关系却更为明确的中华世界秩序，其范围：西起帕米尔高原、北至外兴安岭、恰克图、巴尔喀什湖一线，南跨喜马拉雅山、缅甸、暹罗、老挝、安南和南海诸岛。

可见，至少从17世纪初期起，东西方之间已存在着中华世界秩序（由于该秩序由“华”与“夷”两部分组成，故亦称华夷秩序）与欧洲国家体系相互对峙的局面。由于华夷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周边诸国接受其册封，前者高踞“上国”地位，责成后者奉正朔“遵名分”以示臣服，允其通商以为“羁縻”；后者向前者称臣纳贡，甘居属国或下国地位。该秩序虽称得上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完全由对中国的直接关系所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华夷秩序的向心构架决定了其本身隐含着一种墨守成规、缺乏扩张机制的因素。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而不受周边夷狄国家间互相对立和斗争的影响，即使有时也呈现扩张的趋向，实不过是因中国皇帝或王朝需要而发生的偶发现象。因此，当华夷秩序在明朝初年获得迅速扩展以后，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程而获得大规模的膨胀。相反，欧洲国家体系是由

许多大小不一的国家相互之间的横向关系构成的，其中没有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中心国家，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是至少在法律上平等独立的各国间的平列关系。然而这种离心的横向的国际秩序，其内部却具有一种进攻性的、扩张的机制，所有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都通过向欧洲外部世界的扩张，通过向外吸收物质能量使自己强大起来。而所有反对霸权，力图维持欧洲均势的国家，也同样是通过向欧洲外部世界扩张，使自己更加强大。因此，随着时代的进展，东西方两个国际秩序的接触，前者向后者的冲击或扩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中西交通自古有之，但在15、16世纪世界海道大通以后，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中西交通是从通商开始的，而且鉴于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初次来华有辱使命的教训，西人往往以“朝贡”为通商的护符，佯称“贡使”，并严格遵守中国朝贡制度的规定。据统计，在1655—1795年这140年间，西方使节来华入觐中国皇帝至少有17次，除了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子爵（Viscount Macartney）以外，其余俄国、葡萄牙、罗马教廷和荷兰等国的使节都行了三跪九叩之礼。^①因此，直至18世纪末期，东方华夷秩序并未因为与西方欧洲国家体系的接触而受到大的冲击。雄踞在华夷秩序峰巅的清朝统治者依然故我，相信华夷秩序是万能的、不朽的。殊不知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的缓慢进程，以前作为“夷狄”前来“归化”标志的朝贡制度，此时已开始蜕变为一种仅仅谋求同中国通商

^① 费正清：《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第1册，第14、32页。

的手段。至于来华的西方商人，其所以愿意（或至少在表面上）恪守中国的传统体制，同样只是企望通过对华贸易获得丰厚的利润。可是西人在重商主义驱使下所采取“入境随俗”的灵活态度，却不幸成为中华帝国统治者“华夏中心论”的又一证据，从而更加坚定地相信，朝贡制度是处理对外关系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不二法门。故在《嘉庆会典》和《礼部则例》的朝贡名册上还赫然开列着上述西方国家的名单，并注明，由于它们“远越重洋”，因而“贡期无定”。^①

其实，当时的西方早已迈入具有近代物质文明和近代意识的近代文明社会。特别是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寻找广阔的消费和原料市场已成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对取代法国控制了印度半岛，而且在广州占据了中国的海外贸易的最大份额的“成就”并不满足。为了占据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市场，他们下决心要用自由贸易来打破中国的传统藩篱，把对华贸易放置在“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上。”^② 因此，18 世纪末马戛尔尼子爵和 19 世纪初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先后来华谋求建立中英对等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所引起的“跪叩礼之争”，可以视作代表着整个欧洲国家体系——而不单纯是英国，向正在衰退变质的华夷秩序和朝贡制度提出的最初的公开挑战。

1834—1839 年是中英关系酝酿巨变的时期。英国数十年来向中国谋求对等外交关系的欲望，由于英国政府取代东印

① 参见《嘉庆会典》第 31 卷；《钦定礼部则例》第 178、180、199—200 卷。

②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的中英通商史》（M.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Opening of China, 1800—1842*），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78 页。

度公司负起直接处理中英关系的责任，在此时表现得更加强烈，而这又为中国的传统体制所不允许。中英在观念上的隔阂，外交上的冲突，以及英国在经济上的扩张和所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终于导致中英之间爆发一场战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英国自18世纪末期以来谋求以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企图一再受扼之后所施行的极端手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第一次战争的继续和扩大。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中西条约，显然是列强迫使清政府对其强盗逻辑的单方面的接受。中西条约关系的成立，其意义并不亚于鸦片战争的本身。它向世界表明，前此居于中华世界秩序峰巅、与东亚诸国具有主从关系的中国，现已与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处于法律上的平行关系、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了。作为朝贡体系中枢的中国，已开始被纳入近代欧美列强的条约体系之中了。从此，虚弱而缺乏自救能力的中华帝国，日益成为西方列强在“合法”的幌子下进行政治上奴役和经济上掠夺的对象。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华夷秩序的崩溃是与居于其中枢地位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和同时完成的。

二

所谓外交观念，就是指对本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定位以及对国际社会和发展趋势的基本态度。而外交观念的早期现代化，即是指以近代国际政治生活规范为指导、接受并运用国际法原理、国家主权观念和均势理论，通过谈判等和平手